

民族主义与中日韩三国近代的历史观

归泳涛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中日韩三国近代历史观的比较,指出民族主义既是三国近代历史观得以形成的共同思想基础,也是造成三国历史认识相互冲突的重要根源。东亚三国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达成共识,就需要超越民族史观的局限,从构建东亚未来国际秩序的高度,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历史。

关键词 中日韩 历史观 民族主义 近代

历史认识问题是当前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难题。历史认识上的分歧存在于中日、中韩、日韩这三对双边关系中。要在三国之间消除误解、达成共识,除了应当辨明具体的历史事实之外,更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因为如果历史观是狭隘的,那么整个的历史叙述就很可能产生谬误。

何谓历史观?简单地说,历史观就是指人们对以往世界所持有的一种整体的、系统的看法。我们在认识历史时,不可能直接体验过去,也不可能把握过去的全部,而只能对纷繁芜杂的历史材料进行选择、评价,并赋予历史前后连贯的逻辑。在这一认识过程中,历史观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帮助我们确立选择、评价的标准,并提供理论上的解释。因此,历史观是一种认识历史的工具,是一种主观的视角,而不是客观的事实本身。

历史观与历史学也是不同的。如果说历史学主要是学术领域的专业研究,那么历史观则往往涉及现实政治,它经常由那些怀有明确的政治思想的人物首先提出并加以倡导,继而通过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向一般大众传播。事实上,历史观之

* 归泳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邮编 100871)

** 本研究得到北京大学桐山教育基金的奖助。

《中日韩共同编纂东亚近现代史:让历史告诉现在和未来》,《人民日报》2005年6月10日,第5版。

所以具有选择、评价和解释历史事实的功能,与它背后蕴藏的政治道德标准是分不开的。在那些狭隘的历史观背后,往往是狭隘的政治思想在作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对历史观给予特别关注的原因。

中、日、韩三国在近代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这其中也包括历史观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潮无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促使东亚三国的历史观从传统走向近代,并奠定了东亚三国当代历史观的基石。本文试图以民族主义为线索,考察中日韩三国近代历史观的形成,并揭示它们在政治思想上的共同点和差异。当然,三国近代的历史观内容庞杂,同一时期往往有多种历史观并存,同一种历史观也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本文不可能对此作面面俱到的述评,而只能选择三个国家中较有代表性并相互关联的历史观——日本的文明史观、中国的新史学史观和国粹主义史观、韩国的独立史观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

关于中日韩三国各自的近代历史观,国内外学术界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大部分研究主要从史学史的角度展开分析,对历史观的现实政治性则关注不多。而且,把三国的历史观放在一起进行综合比较的研究还很少见。本文试图在这一问题上做初步的尝试。

一、从文明史观到民族史观

近代西方对东亚的冲击,既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鸦片战争冲破了中国的大门,也揭开了东亚国家“开眼看世界”的序幕。面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中日韩三国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全世界。其中最著名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这两本书是东亚国家的知识分子系统地介绍世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和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史学是两股最有影响力的史学思潮。它们的出现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历史观在中国的诞生,两者之间既有共通之处,也有差异。因此,本文选取代表这两股史学思潮的有关人物作为探讨中国近代历史观的切入点。参见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308页。

国内外学者依国别论述中日韩三国近代历史观的研究主要有: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田中彰、宫地正人编:《历史认识·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3》,东京:岩波书店1991年版;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沈仁安、林铁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沈仁安、宋成有:《近代日本的史学和史观》,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史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17—448页;John S. Brownlee, *Japanese Historians and the National Myths, 1600—1945*, Vancouver, BC: UBC Press, 1997; Hyung Il Pai, *Constructing "Korean" Origins: A Critical Review of Archaeology, Historiography, and Racial Myth in Korean State-Formation Theor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由于笔者语言能力所限,本文关于韩国的研究主要依据韩国学者用英文或中文撰写的著作、相关的中文译著以及中国学者的韩国学论著。

韩国和日本分别有学者对东亚的历史观作过比较研究,参见李润和:《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浦野起夫:《日中韩的历史认识》,东京:南窗社2003年版。

界史地知识的开山之作,不仅给中国思想界以极大的启示,而且被介绍到日本和韩国,对西学在东亚的传播起到了开辟鸿蒙的作用。

在引入西学的过程中,西方近代的历史观也相应进入了东亚知识分子的视野。但是,中国的洋务派拘泥于“中体西用”论,只主张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对引进人文社会科学并不积极,他们对历史采取了“增其新而不变旧”的矛盾态度,总的来说仍未突破传统政治观念的束缚。当时的朝鲜王朝也是步清朝的后尘,固守华夷观念。相比之下,日本对西学的吸收更为敏锐和积极,明治初期就引入了当时盛行于西方的文明史观,并将其日本化。

文明史观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方兴未艾,这一史观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从野蛮到文明、从低级到高级的无限进步的过程,冲破了中世纪用神的意志来解释历史的宗教史观。体现这种历史观的代表著作,如法国人基佐的《欧洲文明史》和英国人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在出版后不久就被译成多个日文版本,在日本国内名噪一时。日本启蒙思想的领袖人物福泽谕吉对这一西方的史学思潮极为重视,把上述两本著作作为他创办的庆应义塾(今庆应义塾大学的前身)的教科书。他本人还撰写《文明论概略》一书,大量吸收基佐和巴克尔的观点,借以批判日本传统的历史观。他指出,“直到目前为止,日本史书大都不外乎说明王室的世系,讨论君臣有司的得失,或者像说评书者讲述战争故事那样记载战争胜负情况。就是偶尔涉及与政府无关的事,无非是记载一些有关佛教的荒诞之说,是不值得一看的。总而言之,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

在文明史观的影响下,日本的许多历史书都冠以文明开化之名(日语中的“文明”和“开化”都译自civilization一词),如北川藤吉的《日本文明史》、渡边修次郎的《明治开化史》、室田充美的《大日本文明史》、藤田茂吉的《文明东渐史》等。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全书贯穿了对社会进化规律的认识和对社会物质基础的重视,与福泽的《文明论概略》一道奠定了日本文明史观的基石。

值得注意的是,与许多欧洲启蒙学者不同,福泽谕吉虽然提倡文明开化,但并

关于《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对日韩两国的影响,参见李扬帆:《走出晚晴——涉外人物及中国的世界观念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72、96—97页;宫地正人:《幕末·明治前期历史认识的构造》,田中彰、宫地正人编:《历史认识·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3》,第514—516页;李光麟:《韩国开化史研究》,陈文寿译,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9页。

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第90—94页。

朝鲜王朝于1897年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本文在特指1897年前的韩国历史时,使用“朝鲜”这一国名,在其他情况下则使用“韩国”这一国名。

参见沈仁安、宋成有:《近代日本的史学和史观》。

王晴佳:《论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上)》,《河北学刊》2004年7月,第128—133页。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7页。

田口卯吉:《日本开化小史》,余又荪译,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

不将文明作为最终目的,而只是把文明作为实现国家独立的手段。他以“论我国之独立”作为《文明论概略》的最后一章,认为“今天号召日本人向文明进军,就是为了保卫我国的独立。所以说,国家的独立就是目的,国民的文明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可见,福泽提倡文明史观的真正用意,还在于启迪民族意识,激发民族主义。这样的历史观,自然契合了日本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需要。

如果说福泽谕吉的文明史观是以文明之名,求民族之实,那么当这一史观传到中国、韩国以后,其民族主义的特征就更加彰显了。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不仅意味着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彻底冲毁了东亚传统的华夷秩序。在中国,维新派取代洋务派成为推动历史变革的力量。早在戊戌变法前的1896年,梁启超就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中提出,中国旧史,“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西国之史,“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显然,他在这里已经意识到了吸收西方文明史观的必要性。

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进一步学习西方和日本的启蒙思想和历史学,终于系统地提出了近代意义上的新历史观,从而成为中国倡导新史学的第一人。1901—1902年,他接连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提出了一整套论述历史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方法的史学理论。在文中,梁启超痛斥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帝王之家谱,“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他尖锐地指出,旧史学妨碍了国民意识的发达,原因在于四个弊端,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在梁启超看来,中国要建立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就必须从思想上推翻旧史观,确立新史观。

梁启超还明确提出,历史的目的或者说功用乃是为了民族和国家的进步和发达。他通过对中西学术的比较,揭示了历史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指出,“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国粹派史家章太炎虽然在政治上与梁启超立场不同,但他对新史学的倡导却与梁氏异曲同工。章太炎竭力提倡历史民族主义,认为“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他解释说,“民族主义,如稼穡然,要以史

John S. Brownlee, *Japanese Historians and the National Myths*, p. 72.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第190页。

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1,第70页。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9,第3—4页。

同上书,第1页。

章太炎:《答张季鸾问政书》,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5—638页。

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总体来说,国粹派史家们与梁启超一样,强调以“民史”为重,不偏重政治史,不以帝王为中心,并主张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应着重说明其对社会发展的贡献。

随着福泽谕吉、梁启超等人的著述被译介到韩国,上述启蒙思想和新历史观就被韩国的知识分子所吸收,成为他们推动历史变革的思想武器。19世纪末的韩国受到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压迫,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历史教育激发民族意识的紧迫性凸现出来。由于长期受到华夷观念的影响以及作为中国藩属的历史,韩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矛头首先集中于摆脱中国的影响。例如,开化派知识分子朴泳孝在1888年提出的国政改革奏疏中称:“先必教育百姓以国史、国文和国语,不教本国历史与文章而教清国的历史与文章,因此百姓亦以清国为典范且重视他,却遗忘自己国家之典故,此乃颠倒本末之举。”另一位开化派人物俞吉浚则仔细区分了华夷秩序中的朝贡国与西方国际体系中的属国,提出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有名无实,并由此认为朝贡国是独立的国家。

到了甲午战争以后,清朝不得不承认朝鲜王朝的独立地位,这一国际环境的变化催生了新的韩国史观,其主旨就是培养独立自主的民族意识。在1895—1905年间刊行的几乎所有韩国史中,传说中的檀君已被神圣化为韩国的建国始祖。它们几乎都强调,韩国自檀君以来就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从来不是中国的属国。其中颇有代表性的是崔景焕在1896年完成的《大东历史》,该书序文中指出:“此书以独立为主旨,普及阅读此书,人们才会知道我国独立已有四千二百余年。”事实上,韩国新历史观的主要倡导者是所谓的开化派,他们中的很多人受到日本的影响,意在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谋求近代意义上的国家独立。因此,韩国的民族主义史家最初都把中国作为其主要对立面,而把西方和日本视为近代文明的楷模。

可见,中日韩三国近代的新历史观都是以启蒙思想为根基,以民族主义为主旨。这样的历史观把人民而不是统治者作为历史的主体,以文明的发达而非道德或宗教的信条作为评判历史的标准,起到了推动时代变革的作用。

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1页。

黄绣媛:《晚清国粹派的历史教育工作》,《走向近代》编辑小组编:《走向近代——国史发展与区域动向》,台北:东华书局2004年版,第163—189页。

李润和:《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第88—89页。

王元周:《华夷观与朝鲜后期的小中华意识》,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十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9—95页。

李润和:《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第88—89页。

二、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

虽然说民族意识和进化观念是东亚三国近代历史观的共同基石,但是在具体的背景下,三国对民族和进化的认识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首先,中日韩三国分别是以怎样的标准来界定历史中的民族的呢?换句话说,在中日韩三国的近代历史观中,是哪些人构成了中国民族、日本民族和韩国民族呢?

如上所述,福泽谕吉在日本宣扬启蒙思想的目的,就在于培养民族意识。也就是说,要启发人民关心国事,改变政府与国民之间的主客关系。于是,在日本的文明史观中,国民就成为历史的主体,其对立面是专制的统治者。这样的民族史观与明治初期日本面临的时代课题密不可分。对当时的日本来说,要使刚刚成立的明治政府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政治合法性,同时又要激励人民团结起来保卫国家的独立,就必须否定幕府时代的专制统治,从政治上给予人民自由、平等的地位。所以,不论是启蒙主义者,还是自由民权论者,都将“民权”和“国权”的结合作为他们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这样的民族观念与皇学家们主张的“国体论”划清了界线,具有明显的近代民主思想的意味。

然而,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退潮,“国权论”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日本的民族主义从“内治”优先走向“外竞”优先。在这一背景下,文明史观的矛头也从批判国内专制统治,转向了日本主导下的所谓东亚“文明化”。与此相对应,以国民为主体、以统治者为客体的历史观念,也转变成了以日本为主体、以亚洲其他国家为客体的历史观念。《文明论概略》发表后刚刚六年,福泽谕吉就在《时事小言》一文中声称,“在东洋列国中,能成为文明的中心和他国的魁首而与西洋诸国对抗的,非日本国民莫属”,对待中国和朝鲜,“必须以武力保护之,以文物诱导之,使之以我国为榜样,迅即进入近时文明之境地。不得已时,亦可诉诸实力强迫其进步。”不可否认,当时的日本在近代化的道路上领先于中国和朝鲜,但是,对明治维新的自我标榜却使得日本以东亚历史变革的领导者自居,从而导致了它对亚洲其他国家的蔑视。

不仅如此,文明史观本来主张以国民而不是统治者作为历史的主体,但实际上并未完全贯彻这一思想。像福泽谕吉这样的文明史家,虽然反对专制统治,但仍然坚持以天皇作为道德的根本,宣扬报国尽忠。随着天皇制的强化,皇国史观日渐得势。这一历史观鼓吹“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和“日本至上”的神国论,以天皇为历史的主体和评判历史的标准。当日本加入帝国主义的阵营后,皇国史观又捏造出

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5卷,东京:岩波书店,1959年版,第186—187页。

荣泽幸二:《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神奈川县:青山社,2001年版,第68页。

所谓的“日鲜同祖论”和“养子论”，试图把韩国和台湾人民纳入天皇制的世系和家族中。此时，文明史观已经无力抵抗皇国史观的进攻，最终淹没在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漩涡中。

近代中国尽管与日本一样面临西方列强的威胁，但民族主义的课题却有很大的不同。日本借助王政复古推翻幕府的统治，一方面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另一方面也留下了天皇制的隐患。中国则既要反对清朝的统治，又要反对列强的压迫，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反清、反帝的双重革命任务。问题在于，承担这两项革命任务的历史主体并不重合，前者是旨在排除满族的汉族，后者则包括中国境内的各民族。这一矛盾导致中国近代初期民族国家界限的模糊，表现在历史观上，就是围绕如何界定民族所产生的分歧。

上文提到的国粹派史家是宣扬排满思想和种族革命的先锋。他们著书立说，极力阐发历史上的“夷夏之防”，同时表彰宋明时期抗元抗清的爱国志士，搜集编纂这些人物的著作，借以伸张“种族大义”。例如，黄节在《国粹学报》上发表《黄史》，强调攘夷狄、辨种族，表现出激发排满心理、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目的。刘师培撰写了《攘书》和《中国民族志》，宣扬攘夷思想，表达了兴汉排满的志向。章太炎在为构建民族认同的过程中，强调满汉不同文更不同种，以血缘区分满汉的差异。他特意撰写《序种姓》一文，意在辨明“夷族”和汉族姓氏的根源，不使其互相混淆，从而把满族排除在中国之外。国粹派的这种历史观固然是为了适应反清革命的需要，但不可否认，其大汉族主义的观念是狭隘的。

与国粹派史家相比，梁启超的历史观以民族国家而非种族作为历史的主体，因而更具近代的意味。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梁启超认识到国家整体的存亡比国内的种族问题更加重要，明确提出以民族国家的思想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撰写《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指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基础。他在论及中国历史的主体时，也突破了传统的“夷夏之防”，认为“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梁启超的这些论述开辟了现代中华

关于近现代的日本民族论，参见小熊英二：《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人自画像的系谱》，东京：新曜社 1995年版。

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第 281—282页。

黄节：《黄史》第 1卷，《种族书第一》，《国粹学报》1905年 2月，第 47—49页。

对刘师培《攘书》和《中国民族志》的介绍和分析，参见黄绣媛：《晚清国粹派的历史教育工作》，第 167—173页。

章太炎：《序种姓》，《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170—190页。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专集 41，第 4页。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 42，第 8页。

民族历史叙述的先河,其民族史观一直影响至今。

近代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亡国之痛最为深切,因此,支撑其历史观的核心价值就是民族独立。对韩国的民族主义史家来说,国史研究甚至就是独立运动本身。爱国史家申采浩明确地把民族作为新历史观的主体,他说,“国家的历史是阐释民族消长盛衰的状态,失去民族则没历史,失去历史则民族对国家的观念也不深刻。呜呼!历史家的责任实在是莫重吧!在他看来,民族的组成元素是言语、人种和国土,其中人种和国土尤为重要。

为了强调韩民族自古以来的统一性和独立性,申采浩极力在史论中排除古代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他提出高句丽主族论,把高句丽人作为朝鲜半岛的土著民族和当今韩国人的祖先。他还主张恢复满洲领土,将渤海再编入韩国。这些片面的观点直到今天仍反映在韩国的中学教科书中。例如,韩国初中《国史》在谈到新罗统一三国时,就称“倘若由高句丽来统一的话,满洲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土地。”

在甲午战争以后,韩国的历史教科书几乎都以“独立”为主题,通过抬高和颂扬当时的王朝,与过去臣属于中国的时代区别开来。写作韩国史的起点,也被重新定在了1392年,即当时王朝起始的年代。在韩民族的起源问题上,大部分教科书都确立檀君为朝鲜的建国者,并开始淡化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说法。申采浩更是明确质疑“箕子东来”的可信性。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历史教科书都肯定韩国的绝对君主制,视国王为民族的象征。这反映出,在当时韩国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对外独立的诉求压倒了对内启蒙的诉求。这一倾向为独立后的韩国留下了独裁统治的隐患。

所以说,在韩国的近代历史观中,历史的主体是一个由朝鲜王朝所代表的、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独立民族,与这个民族相对立的“他者”一开始主要是中国,后来则成为日本。这一点也反映在对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叙述上。例如,创制朝鲜文字的李朝世宗和打败隋朝军队的高句丽将军乙支文德都成为反抗中国的代表,得到极高的评价。而随着日本对韩国控制的加深并最终吞并韩国,原来作为近代化

李润和:《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第142—143页。

事实上,高句丽人和古朝鲜人并不属于同一民族,前者原本也并不居住在朝鲜半岛。高句丽灭亡后,相当一部分高句丽人迁入中原,融入汉族等民族中,只有一小部分与新罗人融合,成为今天韩国人的祖先。参见孙进己:《东北亚民族史论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81页。

事实上,渤海国的领土主要在今天中国的领土上,在朝鲜半岛上的领土仅是一小部分。在渤海国两百余年的历史中,对唐的臣属关系一直较为明确。渤海灭亡后,其后人也只有一小部分融入新罗。因而,渤海国难以被看成是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参见孙进己:《东北亚民族史论研究》,第212—213、482页。

许斌:《从中学历史教科书看韩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教学》2006年第4期,第48—51页。

YoonmiLee, *Modern Education, Textbooks and the Image of the Nation: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Korean Education, 1880—1910*,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2000, pp. 98—103.

楷模的日本变成了必须对抗的“他者”。与此相适应,历史教科书中又新增加了反抗日本的英雄人物。例如,发明铁甲“龟船”在海战中击败丰臣秀吉军队的李舜臣将军,就是在1905—1910年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的这段时间里,逐渐地被塑造成民族英雄的。

三、历史观中的进化与竞争

众所周知,进化论曾对近代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也是近代史学得以形成的关键要素。从历史观的角度看,近代民族史观不仅把民族看成历史的主体,而且认为民族的历史是一个生生不息、不断进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民族都必须面对优胜劣败的生存竞争。对东亚国家来说,这样的历史观可以促使人们对当时的国际关系现实产生清醒的认识,同时激励人们乐观自强。但在现实中,东亚三国对进化史观的认识又有各自的特点,这使得进化史观在三国的近代史上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日本的文明史观认为,从野蛮到半开化再到文明,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西洋各国虽然不是尽善尽美,但代表了“现在人类的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阶段”。这样的历史观摆脱了儒家道德的束缚,以欧美文明作为普世的价值观和评判历史的标准。问题是,作为标准的欧美文明既有其自由平等的一面,也有其武力扩张的一面。当日本把民族主义的侧重点从“民权”转向“国权”时,对欧美文明的认识也从强调“公理”转向了强调“强权”,这样,日本的强国化就成了评判文明与否的唯一标准。

事实上,福泽谕吉从一开始就认为,“文明既有先进和落后,那末,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依据这种简单化的历史观,“文明国”干涉、侵略“非文明国”,就变得理所当然了。所以说,文明史观否定儒家的道德逻辑,固然促进了历史的变革,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种弱肉强食的权力逻辑。在日本的近代史背景下,这一历史观成了日本推行侵略扩张的理论依据。

近代中国的历史观同样属于进化史观。在此,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影响已无须赘言,事实上,进化论的观念在中国近代史家的著述中随处可见。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明确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之进化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他认为,历史不是一治一乱的循环,而是螺旋式的进步。曾鲲化在其所著《中国历史》中称:“近世以来,英国大哲学家达尔文、斯宾塞等,阐发天演公理,曰‘社会者,经岁月而愈复杂者也。人智者,经复杂而愈进化者也’。余谓历史学之精神,

YoonmiLee, *Modern Education, Textbooks and the Image of the Nation: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Korean Education, 1880—1910*,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2000, pp. 103—105.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第9—11页。

同上书,第168页。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9,第10,8页。

亦在此为根据地。”

国粹派史家刘师培更是在《中国民族志》中直接引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学说,阐释汉族的历史命运。他写道,“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种族既殊,竞争自起,其争而独存者必种之最宜者也。中国当蛮族入主之时,夷族劣而汉族优,故有亡国而无亡种,当西人东渐之后,亚种劣而欧种优,故忧亡国更忧亡种。为了保种,汉族当谋振兴之策,振兴之道唯有先推翻满清,才能免于被欧种侵陵并吞,即今日而筹保种之方,必先自汉族独立始。”在论述民族关系的历史时,刘师培也强调华夷之间的争战关系,突出汉族战胜夷族的功绩。他在自己撰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颂扬黄帝、舜、禹以及夏商周时代汉族征服夷族的战争,意在强调民族强大时就能征服弱势民族并扩大疆域,民族衰弱时则只能为强势民族所压制。显然,刘师培在这里援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叙述中国历史,目的在于为兴汉排满、对抗欧美的革命运动寻找理论上的正当性。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虽然受到日本文明史观的影响,但他对进化论的认识并不局限于“弱肉强食”。他对待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不像国粹派那样仅仅强调竞争和冲突。梁启超更多地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去解释中国的历史、寻找中国的位置。这一点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有明显的体现,他写道,“举要言之,则中国史之主的如下: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族几何,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生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这种较为开放豁达的观点与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史观是一致的。

最早在韩国介绍进化论的是甲午改革的策划者俞吉浚。他曾留学日本和美国,接触到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归国后,他发表《竞争论》,提出国家没有竞争,就不能富强。在他的重要著作《西游见闻》中,俞吉浚完全借用福泽谕吉的文明史观,把世界分为开化国、半开化国和未开化国三个等级,认为只要不断努力,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也可以达到进步或开化的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与梁启超相比,韩国近代的史学家似乎并不太关注人类历史的普遍性,而是像中国的国粹派史家那样,更多地侧重于进化论中竞争和冲突的一

横阳翼天氏(曾鲲化):《中国历史》,首编第二章四“进化”,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第179页。

刘师培:《中国民族志》,《刘师培全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册,第626页。

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全集》,第4册,第275—370页。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李光麟:《韩国开化史研究》,第296—304页。

李昌植:《朝日近代思想的形成及其比较研究》,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189页。

面。在他们看来,研究韩国史就是要观察韩民族是如何在跟其他民族的竞争或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方面,朴殷植是运用社会进化论确立韩国民族主义理论的思想家之一。他撰写《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一书,号召韩国人民做时代进化的强者。他还强调,有必要将民族文化的力量与水平胜于其他民族时的事迹,详细揭示出来,以激励人民的爱国心。

申采浩更是以民族斗争的精神将进化论完全融入到他的历史观中。他认为,历史就是记录人类社会的“我”与“非我”的斗争在时间上的发展和在空间上的扩大。他这样写道,“何谓‘我’?何谓‘非我’?简单地说,站在主观位置上的就是‘我’,其他就是‘非我’。也就是对朝鲜人来说朝鲜是‘我’,英、美、法、露(指俄国——引者)等是‘非我’。为了建立自强的民族史观,申采浩潜心研究韩国历史,试图从中寻找国家自存的方法和途径。在研究中,他把叙述的重点集中于韩国的古代史,因为在他看来,这段历史彰显了与中国对等竞争过的高句丽的光荣。他还撰写了《乙支文德》、《水军第一伟人李舜臣传》和《东国巨杰崔督统传》等历史传记,以此弘扬历史上伟大人物通过对外竞争克服国难的事迹。在他看来,这些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既是国民的楷模,也是国民的一员,而韩国国民最重要的品质就在于驱除外来势力的精神和能力。

申采浩在历史叙述中如此强调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斗争,甚至将其视为历史的本质,这是近代韩国深重的民族苦难所致。对当时的韩国来说,要培养民族观念,激发爱国热情,就只有鼓励人民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仍然坚持反抗。所以说,进化论对韩国近代历史观的影响就表现为,借助生存竞争的观念激励韩民族的对外抗争。

四、历史观与国际体系的变革

回顾东亚三国近代历史观的形成及其特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历史观是当时东亚国际关系急剧变革的产物。19世纪末的东亚正处于国际体系大变革的时代,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逐步取代东亚传统的华夷秩序。为了适应新的国际

李永春:《试论20世纪初韩国的爱国启蒙运动》,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十四辑,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52—72页。

朱政惠:《撼天的怒吼,血写的痛史——评朴殷植《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石源华主编:《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365页。

李润和:《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第102—103页。

金河林:《同步与差异——社会进化论对鲁迅与申采浩的影响》,《当代韩国》2005年秋季号,第60—65页。

李润和:《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第104—106页。

崔玉山:《申采浩与梁启超:历史主体认识及“新国民”构想》,《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6月,第40—43页。

体系,中日韩三国都借助民族主义的思想重新构建了自己的历史观。正是来自西方的启蒙思想和进化论,以及现实中列强的帝国主义行径,共同塑造了东亚三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也使得民族觉醒、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成为三国近代历史观的共同特征。

然而,此后三国的民族主义却在东亚的国际关系中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从而导致三国历史观的分道扬镳。日本民族主义在近代化初期的成功使日本很快加入帝国主义的行列,把民族主义的矛头指向了其他亚洲国家。与此相应,日本的文明史观也变成了日本蔑视、干涉乃至侵略亚洲的理论依据。中国在华夷秩序瓦解后,面临重新确立政治和文化疆界、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在经历了军阀割据、抗日战争和内战的洗礼之后,终于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否定少数民族地位的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史观最终被更具包容性的中华民族史观所取代。韩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以失败告终,沦为殖民地的命运使得韩国的民族主义只能在理念的层面上发展,其历史观也相应地带上了理想化的色彩。这主要表现在竭力渲染韩民族古代的辉煌,强调韩民族对外竞争的能力,并把曾经存在于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各古代政权都纳入韩国史的范畴。理念中的历史与现实中的历史出现如此大的反差,也许正反映出近代韩国的历史悲怆感。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三国的历史都翻开了新的一页,但冷战却使得三国间的关系长期处于相互隔绝甚至敌对的状态中。三国的历史观也在各自的政治环境中自行演变,缺乏交流和互动。

冷战的结束使东亚再度步入国际体系大变革的时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日本寻求政治大国的地位,韩国加入发达国家行列,这些新的现实使得三国都必须重新确立自己的民族认同和国际角色。体系的变革必然带来不确定性,近年来民族主义浪潮在三国的出现尽管具体原因各不相同,却都可以被视为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反应。在这一背景下,三国的历史观从冷战时期的相互隔绝走向相互碰撞。由于民族主义固有的排他性和竞争性,这种历史观之间的碰撞常常以冲突而非融合的形式出现。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日韩三国都在积极地探索建立东亚合作的机制。虽然未来东亚地区究竟会形成怎样的制度安排尚不明朗,但可以肯定的是,一百年前的那种弱肉强食的民族主义逻辑是三国都不愿意选择的。尽管历史认识上的分歧难以在短期内弥合,但在三国的政界、知识界和舆论界都出现了对话而非对抗的积极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民族主义史观的反思和超越。

本文所关注的只是东亚三国近代时期的历史观,但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三国当代历史观的源头,它们的影响在百年后的今天依然时隐时现。理解这些历史观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各自的特点,并认识到它们的局限性,也许是我们走向东亚共同的历史认识的第一步。